

新当代
丛书

杨 早 著

传媒时代的 文学重生



新当代
丛书

杨
早 著

传媒时代的
文学重生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Copyright © 2019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作品著作权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传媒时代的文学重生 / 杨早著. —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9.11

(新当代丛书)

ISBN 978-7-108-06618-3

I. ①传… II. ①杨… III. ①中国文学—当代文学—文学研究
②网络文学—文学研究—中国 IV. ① I206.7 ② I207.99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9) 第 090640 号

责任编辑 卫 纯 李方晴

装帧设计 薛 宇

责任校对 曹秋月 曹忠苓

责任印制 宋 家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 22 号 100010)

网 址 www.sdxjpc.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市松源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9 年 11 月北京第 1 版
2019 年 1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 毫米 × 1230 毫米 1/32 印张 9.125

字 数 204 千字

印 数 0,001—5,000 册

定 价 35.00 元

(印装查询: 01064002715; 邮购查询: 01084010542)

杨 早

北京大学文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副研究员，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副秘书长，《话题》系列主编，阅读邻居读书会创始人之一，“腾讯·大家”专栏作者。近年主要关注中国近现代舆论史与文化史、当代文化研究等。

曾发表《京沪白话报：启蒙的两种路向》《五四时期北大学生刊物比较》《评价于丹：学术规范还是传播法则？》《新世纪文学：困境与生机》等论文，著有《纸墨勾当》《野史记》《说史记》《清末民初北京舆论环境与新文化的登场》《民国了》，编有“话题”年度系列（2005-2014）、《沈从文集》、《汪曾祺集》、《六十年与六十部：共和国文学档案》等，译著有《合肥四姊妹》。

本书获“中国社会科学院登峰战略计划·当代文学重点学科”
出版资助

出版说明

进入 21 世纪以来，在新媒介的介入与新的文艺生产（创作）机制作用之下，当代文学与当代文化出现了一些鲜明的新特点，许多 20 世纪未曾有过的新的文学与文化现象纷纷出现，给研究与批评工作带来新的挑战。比如，在传统的小说领域，网络文学异军突起，在传统文学生产（创作）机制之外，在新的媒介与市场力量的推动之下，改造了原来的文学生态，并逐步影响乃至改变了新时代的新读者对于文学本体的认识。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诗歌、电影、戏剧等其他文艺领域。在这些层出不穷的新现象面前，我们发现，自 20 世纪以来我们认为一些恒定的概念，比如什么是文学，什么是小说，什么是电影，什么是批评……都在层出不穷的变化面前日渐模糊。显然，20 世纪以来形成的文学研究方法，面对当代中国正在发生着的变化，显得有些缺乏说服力；而无论是批评者还是研究者，如果真的想严肃地面对这些变化，都会发现自己经常处于一种失语的状态。

有鉴于此，我们计划推动“新当代”丛书的出版。“新当代”包含双重意义：首先，我们将目光聚集在上个世纪末到新世纪以来的新的文学 / 文化现象，并由此上溯当代文学生发的背景、历史发展的轨迹，将新文学与新文化置于社会史与文艺史的双重线索之中加以观察；其次，新媒介、文化体制、方法论和理论建设，

是我们的四种问题意识。我们希望整合当前文艺研究中的中青年学者，以自身的研究方向、研究领域为依托，从具体的问题出发，辨析概念演变的轨迹，探索针对新问题的新方法，寻找面对自身问题的理论语言，为新世纪的文学与文化发展，确立新的坐标。

生活·讀書·新知 三联书店

2019年10月



《传媒时代的文学重生》

杨 早

《当代剧场与中国美学》

陶庆梅

生活·讀書·新知 三联书店 刊行

目 录

骑士怎样变成剧团 1

——传媒时代的文学重生（代序）

骑士与剧团：蹩脚的寓言 1

欲望的反噬：结局早已注定 2

高原与高峰：遗产或债务 4

膨胀与狂欢：碎片化与分众化 6

引言：文化转型与文学重生 9

——分期与征候式人物

第一章 社会转型期的文学震荡 1

第一节 向市场经济转型中的文学现象 2

第二节 海外文艺与文化思潮的冲击 15

第三节 众声喧哗：思想大论争 29

第四节 从中心走向边缘 50

第二章 世纪末：边界的探索 67

第一节 “新”字号小说的浪潮 68

第二节 王朔：《顽主》承载时代情绪 93

第三节 王小波：《黄金时代》引入“狂欢传统” 103

第四节 陈忠实：《白鹿原》展现“民族秘史” 112

第五节 余秋雨：《文化苦旅》的英雄情结 121

第三章 新世纪的钟声：终结与重生 133

第一节 新世纪文学：传媒时代的困境与生机 134

第二节 “莫言获‘诺奖’”的八个关键词 148

第三节 逃离中的陷落：网络小说体制中的资本元素影响 173

第四节 回响：晚清小说与网络小说异同辨 184

第四章 寓文于乐：文学元素的外扩与渗透 199

第一节 评价于丹：学术规范还是传播法则？ 200

第二节 《色，戒》引发的文化震荡 221

第三节 “话题电影”在中国的兴起与出路 242

第四节 城市娱乐：显形与失魂 256

骑士怎样变成剧团

——传媒时代的文学重生（代序）

骑士与剧团：蹩脚的寓言

如果要用文学的手法来描述传媒时代的文学状况，或许是这样的：

骑士退役了。所有的恶龙与风车似乎都在一夜间消失无踪。

他回到了小镇。往日的名气还在，长枪与马镫每天仍然被擦亮。酒馆里给他留着座位，虽然是在角落。

似乎再没有什么需要他去战斗，去捍卫，去冲锋的。人们为他买一杯酒，以示尊敬；讲他一段征战的故事，以示缅怀；还有人出钱，请他表演一次全副武装的巡游。

无论是阳台的包厢还是街边的小摊，欢呼声又一次响起，依然是无数手帕挥舞，还有满天的彩屑。只是这一次谁都知道，没有了出征也没有了凯旋，只是一场表演。

巡游结束，一切繁华如旧。但邀请还在继续，去酒馆讲一段战史，赴宴会去舞一套剑术，或到庆典去持一面大纛，甚至集市也希望他光临担任吉祥物，以为招徕。骑士根本忙不过来。

不过后来商家发现，并不一定要骑士本人出面。只需有人钻

第一节

向市场经济转型中的文学现象

1985年之后，在文坛逐渐形成百花竞放的多元化格局的同时，一股潜流也在悄悄地涌动。在当时，还没有多少人意识到，这股潜流会以爆发的方式，对整个中国文学的格局造成前所未有的冲击。

其时担任文化部部长的王蒙在一次讲话中敏锐地指出：“现在确实有些值得注意的现象。首先是所谓通俗文学实为庸俗文学的冲击，也就是盲目追求金钱的市场力量对严肃的正当的文学事业的冲击。”“其次，最近一段时期，有一种有意无意地贬低和嘲笑文学的社会性、时代精神、现实题材乃至深入生活的意义的论调在传播。”“第三，有些作品由于片面热衷于描写抽象的人性，削弱了对于爱国主义、革命英雄主义的宣扬。最近一个时期，有些刊物竞相发表表现人们的性本能的作品。其中固有严肃之作……确实有些作品是为招徕读者、投合某些读者的低级趣味而炮制的。”^[1]王蒙是从意识形态的角度对上述现象进行批评的（这些现象也的确蕴含了对主流话语的消解），但后来的发展表明，他指出的这些现象正预示着中国文学向市场经济转型的开始。

在此以前，中国文学曾经历了长期从属于政治、为政治服务和短暂地恢复自身审美追求、进行语体实验两个时期。1986年后，在走向市场化的商品经济的冲击和引导下，文学整体呈现出越来越

传统的，都因应着此前对欲望的压抑、对个体的束缚。欲望的释放是社会的需求，整个社会都在发生一种巨大的变化。文学借助对历史和现实的书写，在整个社会争取个人欲望表达与个人权利获取的斗争中，扮演着主要的角色。

特别是1992年邓小平视察南方谈话以后，随着市场经济的确立，中国社会对欲望的追求已经势不可当。无论善恶，无论美丑，真实的欲望已经拥有了绽放的机缘与理性的肯定，这种追求已经无须借助文学的加持与修饰。

相反，恰恰是在这种对欲望的全民性追求当中，无法直接产生物质利益的纯文学，开始退居精神生活的边缘。

这是之前虽然为个人欲望摇旗呐喊，但始终坚持某种非功利与审美标准的纯文学始料未及的后果。20世纪90年代初期的“人文精神大讨论”，充分展示了知识分子精英角色的改变与精英心态的失落。从今往后，文学再也没有了新时期的中心位置。

这个节点伴随着以金庸、琼瑶为代表的港台文学的大举侵入，伴随着以张恨水、王度庐为代表的民国通俗文学的复兴，此间，当代文学处在一个巨大的裂变之中。1997年正是这样一个分裂点，这一年，王朔用作家与影视的完美重组，完成了新时代世俗文化的初步塑形；这一年汪曾祺与王小波的去世，象征着民国文脉的断裂、西方文学思潮的式微，中国文学走到了一个巨大的三岔路口。而抉择，几乎早已注定。

个体、大众、欲望、市场，这些当初中国当代文学曾经为之摇旗呐喊、苦苦追求的语词，变成了挖倒文学中心舞台的挥锄手。“纯文学”不再担当精神生活的主流和启蒙民众的导师，占领它留下的权力真空的，是那些充斥着娱乐意义而规避教化色彩的文化

文化热”。首先是港台文化的“抢滩”，其中金庸和梁羽生的新派武侠小说多达十余种，第一版印数达二百余万册，琼瑶的言情小说则逾十五种。这还不包括大量的非法出版物。其次，内地自身的通俗文学刊物如《今古传奇》《名人传记》《中外传奇选》《蓝盾》，以及各种合法、非法的通俗报刊也在市场纷纷出现，发行量极为可观。与此同时，《收获》《人民文学》《上海文学》等纯文学权威刊物订数大跌，从“文革”后复刊之初的二十万份以上，下降到三万份左右。^[3]再次，许多纯文学刊物则开始通俗化转向，如《安徽文学》改成了以刊登纪实性作品为主的《文学大世界》，《艺术广角》和《文学批评家》也都重新将刊物定位在通俗文化层面。

电影曾在新时期初盛极一时，到80年代中期也颓势难挽。如《晚钟》《找乐》这样在国际上获奖的影片，在国内市场上只能卖出几个拷贝。1985年在影视市场上走红的是日本电视伦理剧《血疑》、中国香港电视连续剧《霍元甲》和《上海滩》。再加上风行全国的卡拉OK、歌舞厅，雅俗文化的对峙态势已经形成，市场的天平也开始明显向通俗文学倾斜。

到了90年代，这种趋势有增无减，纯文学和通俗文学的市场效益落差进一步扩大，如《萌芽》最高发行量曾达三十五万份，到1995年跌至两万份，而《萌芽》用来“以副养文”的附属刊物《电影、电视文学》的发行量是三十七万份；同是上海文艺出版社的期刊，1995年《小说界》的发行量只有三万份，《故事会》则为三百多万份。^[4]

纯文学作家的生存也出现了危机。一方面，以往那种“政府养作家”的制度受到了质疑，王蒙指出：“国家把作家养起来的作

乎都形成一个共识：当代文学“有高原，无高峰”。每年都有说得过去的重量级作品，但就是缺乏配得上伟大时代的文学杰作。这种状况的出现，恰恰是当代文学发展至今，接收的遗产与债务庞杂的共同体现。

经过了新时期的思想解放和创作浪潮，从反转镜面的“伤痕文学”与“反思文学”，到先锋化的语言实验、世俗化的市场磨合，当代文学在结构谋划上，在语言技巧上，已经远远超过了当年的现代白话文学。一大批80年代之后成名的作家完全足以源源不绝地贡献出水准线以上的诸般作品。无论小说、散文、诗歌、戏剧，无不如此。

但不可否认，纯文学涵括的诸般门类，当它们面对现实和历史的书写，都显现出某种程度的疲惫无力。根源或许在于作家对于这个社会的结构变动已经无法全面感知——这种观点似乎能解释为什么为现代汉语提供了典范式语言的汪曾祺，在解答“为什么总是写旧社会”的问题时，表现出一种无奈：

我写旧题材，只是因为我对旧社会的生活比较熟悉，对我旧时邻里有较真切的了解和较深的感情。我也愿意写写新的生活，新的人物。但我以为小说是回忆。必须把热腾腾的生活熟悉得像童年往事一样，生活和作者的感情都经过反复沉淀，除净火气，特别是除净感伤主义，这样才能形成小说。但是我现在还不能。对于现实生活，我的感情是相当浮躁的。（《桥边小说三篇·后记》）

这或许是新时期成名的一大批作家共同的心声。对社会结构的难于理解，对现实生活的难于沉潜，让面对乡土与往事“横刀

转型总结为作家由在“文学时代”写作，转向在“经济时代里写作”，从而宣告“一个时代结束了”。^[9]

二 制造热潮的文学事件

在过去的文学时代，一部书基本可以仅被看作作者和读者之间的交流，责任编辑和出版社充其量是“为他人作嫁衣裳”的裁缝。而在市场经济时代，出版商或刊物编辑充分利用手中的权力，与传媒相配合，成为文化市场的操纵者。他们使用各种手段包装并隆重推出作家作品，通过反复宣传制造时尚，达到引导公众文化消费的目的。有书评这样感叹：“在文学日益失去轰动效应的今天，靠作品本身走红发紫已越来越困难。”^[10]导演石晓华认为“影视创作要有整体构思，要有包装，没成名的更需包装”，导演史蜀君甚至认为“我们不需要评论家，只需要包装人”。^[11]

1989年至1997年十年中，经过包装成为焦点的文坛事件主要包括：

汪国真现象

汪国真的诗歌最早大多是由中学生私下传抄，1989年经广州某出版社包装，风靡一时。他的诗歌里一方面充满“苦涩”“迷惘”“惆怅”等青春期流行情感，如“欢乐总是太短/寂寞总是太长/挥不去的是雾一样的忧伤/挽不住的/是清晨一样的时光”（《感觉》），或是对社会主流的平庸化叛逆，如“我信奉真实/却不信奉谰语/我崇拜真理/却不崇拜权力”（《思想者》）；另一方面也不乏温情洋溢的劝慰和勉励，如“生命是自己的画报/为什么

消除焦虑，而不再负担道德教化与审美升华的功能（用周作人的话说，近于“言志”与“载道”的对立，见《新文学的源流》）。网络文学最重要的诉求是“爽文”，这表明网络文学体制作为一个欲望的空间与平台的本质。

传统的文学体制仍然在顽强地运转，然而文学世界的双峰并峙已然形成，这个世界中又不单只双峰而已，在它们的周围，填充了大量的混沌的文学因素——无论是影视剧、娱乐综艺，还是博客、微博、微信公众号等逐次闪亮登场的新媒体，都蕴含着强大的文学基因，它们同样参与了形塑整个时代的审美品位。

不管是“80后”的代表人物韩寒或郭敬明，以及由此带来的受众群落化，还是传媒时代，每个读者平等参与的对传统文学作品的重新解读（比如，路遥的《平凡的世界》能够长时间地高居公众阅读榜的榜首，已经说明了它与大众心态及社会情绪的契合），甚至是易中天的《说三国》或于丹的《于丹〈论语〉心得》，都展示了传媒时代传统文化资源的重新转化。需求催生消费，而消费反过来创造需求。文学与时代新的关系，喻示着中国当代文学在嬗变的过程中，获得了一种新的位置和新的形状，这种局面前所未有，也无章可循，因此我们可以说，这就是“传媒时代的文学重生”。

中国当代文学从1980年中期一直到21世纪前20年，三十多年来，可以说走出了一条新的道路。这种态势会如何发展，我们现在都还很难给出一个准确的判断。但是可以确定的是，对于这个时代文学状况的观察、梳理、研究，必须有一种新的研究范式、新的解释框架。如若不然，就只会方枘圆凿，研究者徒自陷于失